ChinaXiv合作期刊

职业女性网络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影响因素及社会支持的调节效应研究*

■ 夏佳贝 邓朝华 吴泰来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医药卫生管理学院 武汉 430030

摘 要：[目的/意义]研究职业女性网络健康信息搜寻行为，探明其影响因素，有助于健康信息平台为职业女性提供有针对性的信息服务，满足职业女性的健康信息需求。[方法/过程]以压力应对理论和技术接受模型为理论基础，构建网络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影响因素模型，考虑社会支持对压力作用的调节效应，以职业女性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研和结构方程建模进行实证研究。[结果/结论]研究结果显示，职业女性所面临的工作压力、家庭压力和生理压力会使女性产生焦虑情绪，从而促使她们进行网络健康信息的搜寻。同时，网络的有用性和易用性也决定了职业女性的网络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发现社会支持不仅没有缓解各压力带来的影响，反而会加剧压力，尤其是生理压力的影响。

关键词：职业女性 网络健康信息 信息搜寻行为
分类号：G206
DOI：10.13266/j.issn.0252-3116.2020.23.006

chinaXiv:202304.00024v1

1 引言

社会的进步离不开女性的参与，随着社会迅猛发展，女性地位不断提高，在某些领域中，女性日益显示出无法取代的优势。《2017 年全球性别差异报告》指出，专业技术职位和高等教育女性入学率的性别差异已经消除，同工同酬方面性别差异也有下降，女性与男性人数之比达到 1.07[1]。这表明，我国的女性有着良好的就业前景。离开家庭，步入职场的职业女性不再单纯的把职业当成是谋生的手段，更多是为了满足精神需求和实现自我价值。

然而，伴随着社会竞争的加剧，生活节奏的加快，职业女性背负着工作压力和家庭压力带来的双重负担，心理"亚健康"状态愈发严重，影响着她们的幸福生活。《2017 年职场焦虑指数报告》中指出，女性群体的焦虑指数远高于平均水平[2]，严重影响着职业女性的身心健康。因为作为有家庭、有孩子的职业女性，她们既要面对家庭生活、抚养子女等问题，还要面对工作竞争、自我发展等复杂境遇以及女性独有的生理特点，让职业女性感到不堪重负。因此，应当关注和重视职业女性焦虑心理疾患，提高她们在生活和工作中的应对能力。

随着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公众的健康意识逐步增强。网络已经成为人们获取健康信息的重要渠道之一。《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指出，截至 2019 年 6 月，现有网民 8.54 亿，相比 2018 年增长 2 598 万，互联网普及率达 61.2%，较 2018 年底提高 1.6 个百分点，互联网无处不在[3]。人们使用互联网获取养生、医疗服务等健康信息，借以指导医疗决策制定和改善人们生活方式已成为主流[4]。

在此背景下，职业女性作为在线健康信息用户中的一大群体，已经将网络作为获取健康信息的重要渠道之一。探其原因，职业女性有着较高的学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还有一定的社会经验，学习使用网络技能的速度快，对网络价值有着较高认知，在获取并使用网络资源方面有着较大优势。有研究表明，职业女性在

*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移动医疗环境下医患信任构建模型与关系治理研究"（项目编号：71671073）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项目"基于社交媒体的医患互动对患者健康行为促进机制研究"（项目编号：71801100）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夏佳贝（ORCID：0000-0002-4731-431X），硕士研究生；邓朝华（ORCID：0000-0002-7744-7818），教授，博士生导师；吴泰来（ORCID：0000-0002-2025-3123），讲师，博士研究生，E-mail：wutailai@hust.edu.cn。
收稿日期：2020-04-29 修回日期：2020-07-14 本文起止页码：53-62 本文责任编辑：徐健

ChinaXiv合作期刊

遇到健康状况不佳时,会积极通过网络进行健康信息搜寻[5]。此外,互联网具有方便快捷、资源丰富多样、匿名性等特点[6],使职业女性不仅能方便快捷地获取健康信息,还因匿名性这一特点,使职业女性可以安心地查询和自身有关且相对敏感的健康信息。正如 I. J. Rowlands 在调查澳大利亚女性中发现,使用网络查询的健康信息一般包括心理困扰、月经紊乱、孕期健康等,这些信息有关个人隐私,而通过网络搜寻可以减少尴尬,保护自我隐私[7]。

之前文献研究了网络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影响因素,发现网络健康信息搜寻与性别、年龄、用户居住地、种族、教育程度等因素相关[8-9]。并且之前文献的研究群体多以老年人、大学生、农村居民为主[10],而以职业女性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较少,且对于职业女性的特点缺乏考虑。因此,有必要对职业女性的网络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本文首先以压力应对理论为基础,剖析职业女性焦虑心理产生的压力原因,并探究社会支持在压力和焦虑之间的调节作用。其次,网络健康信息搜寻行为作为一种线上寻求帮助的方式,需要考虑到网络特征。对此,本文以技术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为基础,探索职业女性对网络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接受程度,以期理解、帮助她们进行网络健康信息搜寻的行为。

2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2.1 职业女性的界定

一般认为,职业女性有广义和狭义之分[11]。广义是指从事某一工作并将工作收入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女性,这其中也包括农村妇女。而狭义的职业女性是指参与社会化大生产,通过从事一定社会劳动而获得收入来源的女性。这其中主要是指在城镇中以工作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女性,不包括从事体力劳动、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村妇女。因此,本研究以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职业女性为调查对象,同时也包括个体户和自由职业者,但她们有以下共同特点:①独立自主,我国职业女性不再完全依附于家庭,拥有自己的境遇和发展;②受教育程度高,我国职业女性大都专科以上学历,拥有良好的专业知识,思维敏捷,做事有条理;③收入较稳定,我国职业女性有独立的经济能力,能较好地满足自身、家庭的经济需求。

2.2 压力应对理论

压力应对理论最早是由 R. S. Lazarus 在 1966 年提出的,也被称为压力认知交互理论,是目前运用较为广泛、代表性较强的理论之一。该理论强调认知因素对压力产生中的作用。即压力事件作用于个体后,个体通过对自身的初级评估、次级评估和重新评估对压力采取相对应的应对方式。同时,R. S. Lazarus 认为不能以静态的过程看待压力,在压力源和压力反应之间存在着认知评估的过程[12]。压力源在对个体发生刺激作用之后,是否能够产生压力,这主要决定于认知评估和应对两个心理评估过程。因此,本文以压力应对理论的研究框架为基础,探讨职业女性焦虑情绪对网络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影响机制。

2.3 技术接受模型

TAM 模型由美国学者 F. Davis 于 1989 年提出,最初是用来解释信息系统利用率低的问题[13]。F. Davis 对 152 名用户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与行为表现均成正相关。随后对模型进行了修正,在原有的初始模型中,引入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两个变量。感知有用性及易用性影响着使用态度,同时使用态度又影响着使用意愿和行为表现。TAM 模型被广泛运用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均验证了该模型的合理性。因此,在本研究中,将探讨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对职业女性网络健康信息搜寻意愿的影响。

3 研究假设与模型构建

3.1 职业女性压力来源与焦虑情绪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不断上升,女性的就业率越来越高,使得女性在职场上是不可忽视的一大群体。正因如此,女性多重角色冲突、职场上的激烈竞争以及独有的生理特征,使女性承受着较大压力[14]。当对已知压力源的利害关系评估为威胁时,说明所需要的应对能力已超出范围,个人会产生消极情绪,将会对职业女性的身心健康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有研究表明,职业女性焦虑情绪已严重影响职业女性的身心健康[15]。综上所述,工作压力、家庭压力、生理压力代表着 3 种不同职业女性压力来源形式,通过这些压力来源能够显著影响其焦虑情绪。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1a:职业女性工作压力对焦虑情绪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1b:职业女性家庭压力对焦虑情绪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1c:职业女性生理压力对焦虑情绪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chinaXiv:202304.00024v1

ChinaXiv合作期刊

3.2 职业女性焦虑情绪与网络健康信息搜寻行为

压力无处不在，充斥在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之中。职业女性面对压力时，会寻求帮助，缓解焦虑情绪。寻求帮助除了向周围父母、亲戚、朋友获取支持外，有研究表明，产生焦虑的个人会通过网络健康信息搜寻来寻求安慰[16]。同时，C. Lagoe 在研究中得出相似结论，认为女性对健康风险的感知更敏感，产生的焦虑水平比男性高，从而影响健康信息搜寻行为[17]。通过网络健康信息搜寻可以对自身的健康问题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利用互联网收集有关健康信息，进行自我诊断。并且网络健康信息搜寻有较好的匿名性，可以放心的查询相对私密的问题。基于此，本研究假设：

H2：职业女性焦虑情绪对网络健康信息搜寻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3.3 感知有用性与网络健康信息搜寻行为

"感知有用性"是指自身使用某种信息手段对其工作效率提高的影响，是最初的技术接受模型中两大核心变量之一。已有诸多研究证明感知有用性对使用态度和行为意愿有正向影响作用。吴孝仙在他研究里发现，怀有孩子的职业女性是网络搜寻健康信息的主流，搜寻的健康信息包括：孕期知识、膳食营养知识、医药信息。她们认为，健康网站和论坛提供的信息有助于减轻孕期的孤独感和不确定性[18]。鉴于此，本研究的感知有用性定义为网上健康类信息对职业女性而言是否有价值，能否解决遇到的健康问题。并提出感知有用性对网络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有关假设：

H3：感知有用性对网络健康信息搜寻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3.4 感知易用性与网络健康信息搜寻行为

"感知易用性"是指自身相信使用某种信息手段的容易程度。在 F. Davis 的研究中，感知易用性已被证明对个体的使用态度和行为意愿具有正向影响。J. Rowley 研究发现，女性对网络健康信息的有用性和易用性较为看重[19]。网络搜寻健康信息具有便利性，在不去看医生的情况下获取信息是非常方便的[20]。鉴于此，本研究的感知易用性定义为职业女性浏览、熟练获取及理解网上健康类信息的容易程度。并提出感知易用性对网络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有关假设：

H4：感知易用性对网络健康信息搜寻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3.5 社会支持对职业女性压力来源与焦虑情绪的调节作用假设

走出家庭的女性，面对社会的激烈竞争，承受着和男性同样的社会压力，使她们常常对自己的身份定位感到困惑。因此，职业女性更需要来自各方面的关心、理解和支持。有结论表明，社会支持可以缓和压力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21]。社会支持是指个体得到来自他人或者其他群体的关爱和帮助[22]。本研究将从主观社会支持层面进行阐述。主观社会支持是指能够对个体的心理状态产生影响的社会支持，又被称之为领悟社会支持[23]。领悟社会支持满足了人们的心理需求，缓解了各方面压力，提高了心理承受能力，对于减轻焦虑情绪有积极效果。由此，本文以领悟社会支持定义为基础，提出社会支持在职业女性压力来源与焦虑情绪之间发挥作用的有关假设：

H5a：社会支持在职业女性工作压力与焦虑情绪关系之间发挥负向调节作用；

H5b：社会支持在职业女性家庭压力与焦虑情绪关系之间发挥负向调节作用；

H5c：社会支持在职业女性生理压力与焦虑情绪关系之间发挥负向调节作用。

由上研究假设，构建职业女性网络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影响因素模型，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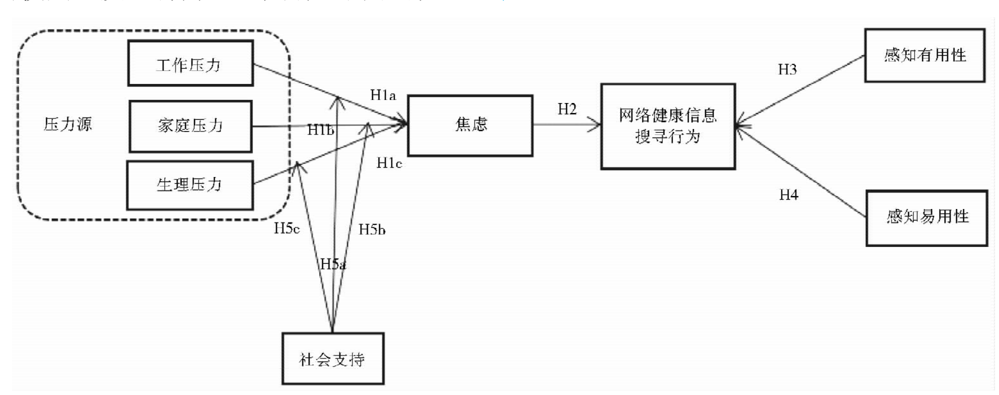


图 1　研究模型框架

chinaXiv:202304.00024v1

ChinaXiv合作期刊

4 数据分析及讨论

4.1 调查问卷设计

为了对构建的影响因素概念模型进行验证，对已有成熟量表进行整理修改，形成调查问卷的主体部分。结合本研究的需要，让问卷更完整、合理，将问卷发放给职业女性进行预调查，并对问卷的细节进行修改，提高问卷的质量。正式调查问卷由 3 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卷首语。第二部分为基本信息调查。该部分主要包括 7 道题。第三部分为调查的主体部分，主要包括 34 道题。使用 5 级李克特量表，范围从 1 到 5，每个问题都由“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5 项组成。主体部分问卷内容由表 1 所示：

表 1 各变量测量量表

变量	问卷内容	参考文献
工作压力(WS)	1. 因为工作量大，我一直有时间上的压力	A. Loerbroks[24](2017)
	2. 我早上一起床就会开始想着工作上的事	
	3. 我上床睡觉时还在想着工作上的事	
家庭压力(FS)	1. 我经常与家庭成员发生冲突	A. Loerbroks[24](2017)
	2. 我的家庭经济负担重	
	3. 我感觉需要赡养老人和抚养孩子是负担	
	4. 我认为工作和家庭无法兼顾	
生理压力(PS)	1. 我在月经期间，感到烦躁、易怒疲惫	刘巧玲[14](2015)
	2. 我在妊娠期期间，感到焦虑、抑郁	
	3. 我在哺乳期期间，感到情绪低落、思维迟钝	
	4. 我在更年期期间，感到焦虑、抑郁	
焦虑情绪(AR)	1. 压力让我感到不舒服	S. A. Brown[25](2004)
	2. 压力让我感到紧张	
	3. 压力让我感到不安	
	4. 压力让我感到害怕	
网络健康信息搜寻行为(IHISB)	1. 遇到健康问题时，我经常会通过网络来查询相关健康信息	W. Cao[26](2016)
	2. 我经常使用健康信息的网络平台来获取信息	
感知有用性(PU)	1. 我认为使用网络健康信息能满足我的健康需求	F. Davis[13](1989)
	2. 我认为使用网络健康信息能节省我的时间	
	3. 我认为使用在线健康信息使我很容易解决健康问题	
	4. 我认为使用网络健康信息对我是有用的	
感知易用性(PEU)	1. 我认为利用网络搜寻健康信息的操作很容易	F. Davis[13](1989)
	2. 我认为熟练使用网络健康信息很容易	
	3. 我认为网络上健康信息的内容清晰易懂	
	4. 我认为使用网络健康信息实现我想做的事很容易	
社会支持(PSS)	1. 在我遇到问题时有些人(父母、家人、朋友)会出现在我的身旁	A. Osman[27](2014)
	2. 我能够与有些人(父母、家人、朋友)共享快乐与忧伤	
	3. 我的家庭能够切实具体的给我帮助	
	4. 在需要时我能够从家庭获得感情上的帮助与支持	
	5. 当我有困难时有些人(父母、家人、朋友)是安慰我的真正源泉	
	6. 我的朋友们能真正的帮助我	
	7. 我能与自己的家庭谈论我的难题	
	8. 在我的生活中某些人(父母、家人、朋友)关心着我的情绪	
	9. 我的家庭能心甘情愿协助我做出各种决定	

4.2 样本情况

样本的数据收集过程从 2020 年 3 月 5 日至 15 日。主要通过网络渠道收集，通过问卷星平台进行问卷设计，邀请被试者通过微信群和 QQ 群填写调查问卷。共回收了 306 份调查问卷，经过整理和筛选，删去填写不完整、极端选项过多、作答时间不到 60 秒的无效问卷之后，共计回收有效问卷 292 份，有效率为 95.4%。样本特征如表 2 所示：

chinaXiv:202304.00024v1

chinaXiv:202304.00024v1

表 2　人口统计学基本特征(N=292)

变量	选项	频数	百分比(%)
年龄	30 岁以下	151	51.7
	31-40 岁	85	29.1
	41-50 岁	30	10.3
	51 岁以上	26	8.9
受教育程度	高中/技校/中专及以下	23	7.9
	大专/大学本科	215	73.6
	研究生及以上	54	18.5
婚姻状况	未婚	101	34.6
	已婚	185	63.4
	离异	6	2.1
是否有孩子	是	181	62.0
	否	111	38.0
职业	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员工	90	30.8
	国营企业员工	66	22.6
	民营企业员工	99	33.9
	个体户/自由职业者	31	10.6
	其他	6	2.1
收入	0-3000 元	36	12.3
	3000-6000 元	117	40.1
	6000-10000 元	99	33.9
	10000-15000 元	30	10.3
	15000 元以上	10	3.4
工作年限	0-3 年	82	28.1
	3-10 年	121	41.4
	10 年以上	89	30.5

4.3　实证方法

本文采用 SmartPLS 建模软件对研究数据进行分析。PLS-SEM 对样本量要求相对较低,不要求样本数据服从正态分布,且可同时处理反映性指标和形成性指标,更适合探索性研究[28]。以.CSV 格式导入数据,通过 PLS ALgorithm 和 Bootstrapping 自助法分别得到模型评估测量指标和假设关系的显著性检验。

4.4　模型有效性分析

对模型的测量评估包含信度和效度检验。其中 Cronbach's α 和 CR 值用于衡量可靠性,判别效度和收敛效度用于衡量有效性。得到表 3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如下。Cronbach's α 和 CR 值均大于 0.7,说明模型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29]。各潜变量的 AVE 值均大于 0.5,说明测量模型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30]。判别效度由各潜变量 AVE 值的平方根和相关系数检验,模型各潜变量的 AVE 值的平方根均大于相关系数,说明测量模型有较好的判别效度[31],详见表 4。

表 3　验证性因子分析

题项	标准荷载	Cronbach's α	AVE	CR
工作压力		0.724	0.624	0.832
WS1	0.829			
WS2	0.802			
WS3	0.735			
家庭压力		0.750	0.570	0.841
FS1	0.726			
FS2	0.780			
FS3	0.766			
FS4	0.748			
生理压力		0.907	0.782	0.935
PS1	0.835			
PS2	0.913			
PS3	0.895			
PS4	0.893			
焦虑情绪		0.920	0.807	0.943
AR1	0.878			
AR2	0.930			
AR3	0.936			
AR4	0.846			
搜寻行为		0.799	0.832	0.908
IHISB1	0.908			
IHISB2	0.917			
感知有用性		0.895	0.760	0.927
PU1	0.856			
PU2	0.882			
PU3	0.861			
PU4	0.888			
感知易用性		0.892	0.755	0.925
PEU1	0.879			
PEU2	0.880			
PEU3	0.861			
PEU4	0.855			
社会支持		0.926	0.633	0.939
PSS1	0.747			
PSS2	0.810			
PSS3	0.861			
PSS4	0.846			
PSS5	0.855			
PSS6	0.620			
PSS7	0.817			
PSS8	0.779			
PSS9	0.799			

ChinaXiv合作期刊

表 4 因子 AVE 值平方根与因子间相关系数矩阵

	WS	FS	PS	AR	IHISB	PU	PEU	PSS
WS	0.790							
FS	0.435	0.755						
PS	0.392	0.476	0.885					
AR	0.392	0.423	0.598	0.898				
IHISB	0.300	0.113	0.301	0.158	0.912			
PU	0.165	0.075	0.165	0.057	0.604	0.872		
PEU	0.107	-0.018	0.060	-0.033	0.562	0.765	0.869	
PSS	-0.093	-0.348	-0.163	-0.231	0.281	0.395	0.481	0.796

注:对角线为 AVE 值的平方根,下三角区域为因子间相关系数

4.5 模型验证

本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软件 SmartPLS 检验假设模型中,对变量间因果关系与调节作用的假设。通过 SmartPLS 对模型进行路径参数估计,然后利用 Bootstrapping 自助法对原始数据选取容量为 1 000 的重抽样样本,在此基础上检验路径系数的显著性。表 5 列出了各个路径系数值及其显著性,具体结果见图 2。可以看出,模型中的主效应都得到显著验证,而调节效应中,社会支持对工作压力和家庭压力的作用都没有显著影响,同时社会支持正向显著调节生理压力的作用,与研究假设相反。

表 5 结构模型参数评估

假设	路径关系	路径系数	T 值	是否支持	与初始假设相对比
H1a	WS→AR	0.149	2.442 *	支持	正向,一致
H1b	FS→AR	0.103	2.074 *	支持	正向,一致
H1c	PS→AR	0.436	7.839 ***	支持	正向,一致
H2	AR→IHISB	0.145	3.198 **	支持	正向,一致
H3	PU→IHISB	0.390	4.131 ***	支持	正向,一致
H4	PEU→IHISB	0.269	2.523 **	支持	正向,一致
H5a	WS * PSS→AR	0.002	0.027	不支持	无影响
H5b	FS * PSS→AR	-0.019	0.384	不支持	无影响
H5c	PS * PSS→AR	0.129	2.056 *	不支持	正向,相反

注:* 表示 $p<0.05$, ** 表示 $p<0.01$, *** 表示 $p<0.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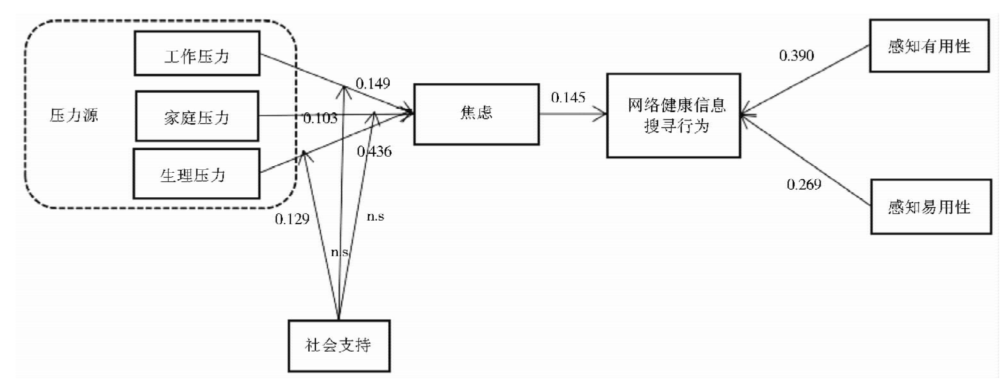


图 2 结构模型假设检验结果

5 讨论与分析

从表 4、表 5 的结果可知,职业女性网络健康信息搜寻行为模型中的大多数假设都得到了实证分析的支持。根据结构模型假设检验结果对其做出如下讨论。

5.1 职业女性压力来源对焦虑情绪影响情况

工作压力、家庭压力、生理压力是职业女性压力来源的三个特征维度,对焦虑情绪产生直接影响。从上一节实证分析中可知工作压力($\beta=0.149$, $p<0.05$)、家庭压力($\beta=0.103$, $p<0.05$)、生理压力($\beta=0.436$, $p<0.001$)对焦虑情绪具有正向影响。这一部分的数据分析结果与初始假设 H1a、H1b、H1c 相一致。在当代快节奏的社会背景下,职业女性不仅需要努力工作,面对高强度、高效率的工作需求。还需要在家庭中扮演好贤妻良母的角色,承担起赡养父母、抚养子女的义务。职业女性扮演的不同角色有着不同的要求,这些都会给职业女性带来不同的压力。而角色冲突难以解决,会影响着职业女性情绪,导致焦虑情绪的发生[15]。还有一点,女性独有的生理特点,让职业女性在面临压力时,会产生内分泌失调的情况。这种情况让职业女性的激素水平有着较大变化,容易引起情绪波动。一旦不能处理好这些生理变化带来的压力,就容易在月经前后期[32]、生产前后期[33,34]和更年期[35,36]产生焦虑情绪。对此,职业女性应当放松自己,调整好心态。面对压力,应与家人及时沟通,获得家人的理解与支持。同时,用人单位应当重视职业女性的付出,建立合理公平的奖惩机制,多鼓励,多肯定,让员工感受到用人单位的关心与支持。并且,作为社会层面,应当鼓励和引导用人单位尊重女性劳动成果,维护女性的合法权益,反对就业性别歧视行为。社会对女性的支持程度,很

chinaXiv:202304.00024v1

chinaXiv:202304.00024v1

大程度上影响了用人单位的行为，进而影响职业女性在工作中的发展。

5.2 焦虑情绪对网络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影响情况

从上一节实证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焦虑情绪对网络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具有正向影响（$\beta = 0.145, p < 0.01$）。这与初始假设 H2 相一致。这主要是因为，职业女性面临着角色冲突，她们既要在职场中，努力拼搏，同男性竞争，为自己在职场中争取到一定的地位。又要努力照顾好家庭，扮演好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两种角色不停的切换，使职业女性的情绪波动较大。与此同时，女性独有的生理特点，也会增大产生焦虑情绪的可能。由此可知，职业女性面对这些压力产生的焦虑情绪，往往都会选择自我消化，默默承受。而网络健康信息便利性、丰富性、匿名性的特点[37]，给职业女性带来福音，很大程度上的满足职业女性对健康信息的需求。因此，网络健康信息提供方可以开发专门适合职业女性使用的 APP。除了医疗信息外，可依据职业女性平常所搜寻的健康信息类型来设计 APP 中的信息，开发个性化健康信息服务平台，有针对性的满足职业女性的信息需求。

5.3 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对网络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影响情况

从上一节实证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感知有用性（$\beta = 0.390, p < 0.001$）、感知易用性（$\beta = 0.269, p < 0.01$）对网络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具有正向影响，与初始假设 H3、H4 相一致。这与 L. Xia [38]、H. Liang [39] 等研究结果是一致的。职业女性通过网络来获取有关健康信息知识，当她们感知信息有用且能对自身产生实际影响时，会对网络搜寻健康信息形成积极的态度，从而促进职业女性对网络的使用。感知易用性是职业女性使用网络搜寻健康信息的前提条件。健康平台流程简单，页面清晰简洁，操作顺畅，使用方便，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学习使用，大大提高了职业女性的搜寻意愿。而如果健康信息搜寻复杂，那么对于职业女性来说即使网络健康信息资源丰富，其搜寻意愿也会大大降低。因此，建立高质量的健康信息网站。提供权威、有效的网络健康信息，增强信息内容的可信度和有用性。同时，加强并完善健康网站的建设。进一步简化网站操作流程和界面设置，减少互动平台在职业女性进入网站时的弹出频率，减少在搜寻信息时造成的阻碍。

5.4 社会支持对职业女性压力与焦虑情绪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情况

从上一节实证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社会支持在职业女性工作压力、家庭压力与焦虑情绪之间没有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且社会支持在职业女性生理压力与焦虑情绪之间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beta = 0.129, p < 0.05$），与初始假设 H5c 不一致。这表明当前职业女性面临生理压力时，获得社会支持越多，所产生的焦虑情绪越明显。即社会支持不会缓解负面情绪，反而会加剧负面情绪。这与 R. G. Kent De Grey 、S. E. Taylor 等[40-45]相关文献研究结论是相一致的。具体而言，社会支持会产生这种作用的可能原因如下：

首先，以不同的方式获得社会支持，除了和社会支持的数量有关以外，还和社会支持的质量有关，低质量的社会支持是不能起到有效作用的。生理压力是职业女性所独有的，周围人语言上的关心可能不能真正有效的安抚情绪，而需要实际行动上的支持，切合实际需求的为职业女性排忧解难。

其次，不是所有的社会支持，职业女性都会接受并好好使用，还要看支持对象的需求，支持者特征，及其与被支持者之间的关系[42]。由于支持者与接受者的人格特征、压力耐受度有所不同，感知到的压力程度不同，从而可能导致不同支持的方式被职业女性接受的程度不一样。当社会支持提供者本身就会引起焦虑和压力时，则会导致社会支持无缓解压力的影响[40-41]。同时，有研究表明，能见度高的社会支持要么无效，要么加剧了压力的作用[44]。因此，要针对社会支持的对象选择合适的社会支持方式，才能给接受者提供有效帮助[43]。

最后，支持关系之外的其他因素也会影响社会支持作用的发挥。A. Jaffar 发现即使在得到社会支持的情况下，婚姻凝聚力较差的失业妇女压力也较大[45]。因此，应该考虑更多影响社会支持发挥作用的因素，为职业女性提供高质量、能被职业女性所能接受的社会支持。

6 研究结论

本文的理论贡献在于，以职业女性为研究对象，整合压力应对理论和技术接受模型两种理论，提出基于压力应对理论与技术接受模型相结合的网络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影响因素模型。该模型在压力应对理论视角下识别并验证了压力源对焦虑情绪的影响，将社会支持纳为调节变量，研究社会支持在职业女性压力源与焦虑情绪之间的调节作用。并提出了焦虑作为压力源对职业女性网络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作用机制。同时引入技术接受模型来测量职业女性对网络健康信息搜

ChinaXiv合作期刊

寻行为的接受程度。通过问卷调查法获得真实有效数据并利用结构方程建模验证了模型的可行性,该模型可为职业女性网络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影响因素研究提供新的理论模型和方法支撑。

本文的实践价值在于,在探讨职业女性网络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提出针对职业女性缓解焦虑情绪的方式。以自身出发,调整好心态,积极面对压力。同时以家庭、用人单位、社会三方面为基础,给予职业女性高质量、能被职业女性所接受的社会支持。最后,加强并完善健康网站的建设,建立高质量的健康信息网站,满足职业女性的健康信息需求,为职业女性的身心健康提供信息支持,有助于家庭稳固和社会稳定,促进社会精神文明。

与现有相关研究相比,本研究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①在理论上,以压力应对理论和技术接受模型为基础,为职业女性的网络健康信息搜寻行为提供更为全面的理论视角,丰富了该领域的理论研究。②在以往研究中职业女性的压力源多以测量工作压力和家庭压力两维度为主,而本文加上生理压力维度,丰富了对职业女性压力来源的研究,使研究模型更加完善。③将社会支持作为职业女性压力来源与焦虑情绪的调节变量,并得出社会支持在职业女性生理压力与焦虑情绪之间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即社会支持不会缓解负面情绪,反而会加剧负面情绪。④使用了科学的研究方法对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进行测量。以往的研究中多用 SPSS 对调节效应进行分步验证,而本文运用 SmartPLS 将调节变量纳入模型整体中进行测量验证,提高了研究结果的精确度。

chinaXiv:202304.00024v1

本文在研究中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①研究的调查对象为职业女性,样本数据来源和群体相对较为单一。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增加男性样本,与女性样本一同比较,使研究更加全面严谨。②对于社会支持维度中的测量项,由于原始量表的限制,支持人群多以更直接、密切的身边父母、家人、朋友为主,而未考虑到工作相关的人员,因此在后续研究中应考虑到与工作相关的支持。

参考文献:

[1] WORLD ECONOMIC FORUM. Global gender gap report 2017 [EB/OL]. [2020-04-28]. http://reports.weforum.org/global-gender-gap-report-2017/.html.
[2] 搜狐网.360 搜索职场焦虑报告显示女性和 80 后群体最焦虑 [EB/OL]. [2020-04-28]. https://www.sohu.com/a/158366723_565985.html.
[3] 于朝晖. CNNIC 发布第 44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J]. 网信军民融合,2019(9):30-31.
[4] 王锰. 美国网络健康信息用户获取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J]. 信息资源管理学报,2013, 3(3):47-58.
[5] NIKOLOUDAKIS I A, VANDELANOTTE C, REBAR A L, et al. Examining the correlates of online health information-seeking behavior among men compared with women[J]. American journal of mens health,2016, 12(5):1358-1367.
[6] 周晓英, 蔡文娟. 大学生网络健康信息搜寻行为模式及影响因素[J]. 情报资料工作,2014(4):50-55.
[7] ROWLANDS I J, LOXTON D, DOBSON A, et al. Seeking health information online: association with young australian women's physical, ment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J]. Journal of medical internet research,2015, 17(5):e120.
[8] 李月琳, 蔡文娟. 国外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研究综述 [J]. 图书情报工作, 2012, 56(19):128-132.
[9] LUSTRIA M L A, SMITH S A, HINNANT C C. Exploring digital divides: an examination of ehealth technology use in health information seeking, communication and personal health information management in the USA[J]. Health informatics journal, 2011, 17(3):224-243.
[10] 林婷. 大学生网络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J]. 情报探索, 2018(10):95-100.
[11] 谭卫华. 职业女性角色健康研究初探[J]. 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6):94-96.
[12] FOLKMAN S. Positive psychological states and coping with severe stress[J]. Social science medicine, 1997, 45(8):1207.
[13] DAVIS F. Perceived usefulness, perceived ease of use, and user acceptanc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J]. Mis quarterly, 1989, 13(3):319-340.
[14] 刘巧玲. 职业女性心理压力分析及对策[J]. 学理论, 2015(28):109-110.
[15] 马秀梅. 职业女性焦虑心理疾患的成因分析 [J]. 保山师专学报,2009, 28(2):93-97.
[16] SINGH K, BROWN R J. From headache to tumour: an examination of health anxiety, health-related internet use and 'query escalation'[J]. 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 2015, 21(9):2008-2020.
[17] LAGOE C, ATKIN D. Health anxiety in the digital age: an exploration of psychological determinants of online health information seeking[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5, 52(1):484-491.
[18] 吴孝仙. 某三甲医院孕妇网络健康信息搜寻行为调查 [J]. 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 2018, 27(5):61-64.
[19] ROWLEY J, JOHNSON F, SBAFFI L. Gender as an influencer of online health information-seeking and evaluation behavior [J].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2017, 68(1):36-47.
[20] ALGHAMDI K M, MOUSSA N A. Internet use by the public to search for health-related informa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dical informatics, 2012, 81(6): 363－373.

[21] TURNER J. Social support as a contingency in psychological well-being[J].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1981, 22(4): 357－367.

[22] 陈桂兰.基于系统观视角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及提升策略研究[J].湖南社会科学,2010(2):176－179.

[23] 张静静. 青少年领悟社会支持、自我概念与心理健康关系的探究[D]. 曲阜:曲阜师范大学, 2013.

[24] LOERBROKS A, DING H, HAN W, et al. Work stress, family stress and asthma: a cross-sectional study among women in China [J]. International archives of occupational environmental health, 2017, 90(4): 349－356.

[25] BROWN S A, FULLER R M, CHELLEY V. Who's afraid of the virtual world? anxiety and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J].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ystems, 2004, 5(2): 1－30.

[26] CAO W, ZHANG X, XU K, et al. Modeling online health information-seeking behavior in China: the roles of source characteristics, reward assessment, and internet self-efficacy [J]. Health communication, 2016, 31(9): 1－10.

[27] OSMAN A, LAMIS D A, FREEDENTHAL S, et al. The multidimensional scale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alyses of internal reliability, measurement invariance, and correlates across gender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2014, 96(1): 103－112.

[28] HAIR J F, SARSTEDT M, RINGLE C M, et al. An assessment of the use of partial least squar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in marketing research[J]. 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 2012, 40(3): p.414－433.

[29] TENENHAUS M, VINZI V E, CHATELIN Y M, et al. PLS path modeling[J]. Computational statistics data analysis, 2005, 48 (1): 159－205.

[30] HULLAND J. Use of partial least squares (PLS) in strategic management research: a review of four recent studie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9, 20(2):195－204.

[31] FORNELL C, LARCKER D F. Evaluat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with unobservable variables and measurement error[J].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981, 18(1): 39－50.

[32] VEITH J L, ANDERSON J, SLADE S A, et al. Plasma β-endorphin, pain thresholds and anxiety levels across the human menstrual cycle[J]. Physiology behavior,1984, 32(1): 31－34.

[33] ALTSHULER L L, HENDRICK V, COHEN L S. Course of mood and anxiety disorders during pregnancy and the postpartum period [J].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iatry, 1998, 59 (S2): 29－33.

[34] 孟庆玲. 职业女性妊娠期心理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妇幼保健,2015, 30(13): 2069－2070.

[35] 聂晓峰. 女性更年期焦虑情况与更年期保健策略分析[J]. 临床医药文献电子杂志,2019, 6(86): 92.

[36] TANGEN T, MYKLETUN A. Depression and anxiety through the climacteric period: an epidemiological study (HUNT-II) [J]. Journal of psychosomatic obstetrics & gynecology, 2008, 29(2): 125－131.

[37] LI Y, WANG X, LIN X, et al. Seeking and sharing health information on social media: a net valence model and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social change,2018, 126 (1): 28－40.

[38] XIA L, DENG S, LIU Y. Seeking health information online: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problematic situations on user intention[J]. Journal of data information science,2017,2(2): 78－97.

[39] LIANG H, XUE Y, CHASE S K. Online health information seeking by people with physical disabilities due to neurological condition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dical informatics, 2011, 80 (11): 745－753.

[40] KENT D E GREY R G, UCHINO B N, SMITH T W, et al. (Too) anxious to help? social support provider anxiety and cardiovascular func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physiology, 2018,123 (1):171－178.

[41] TAYLOR S E. Social support: a review[C]//FRIEDMAN H 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health psych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189－214.

[42] GROSS A E, WALLSTON B S, PILIAVIN I M. Reactance, attribution, equity, and the help recipient1[J].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006, 9(4): 297－313.

[43] LEHMAN D R, ELLARD J H, WORTMAN C B. Social support for the bereaved: recipients' and providers' perspectives on what is helpful. [J]. Journal of consulting & clinical psychology, 1986, 54(4):438－446.

[44] BOLGER N,AMAREL D. Effects of social support visibility on adjustment to stress: experimental evidence.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2007,92(3): 458－475.

[45] JAFFAR A, AQEEL M, ABBAS J, et al. The moderating role of social support for marital adjustment, depression, anxiety, and stress: evidence from pakistani working and nonworking women [J].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018,244(1):231－238.

作者贡献说明：

夏佳贝：负责论文内容的撰写；
邓朝华：提出研究命题与思路；
吴泰来：负责论文整体框架与论文修改。

chinaXiv:202304.00024v1

ChinaXiv合作期刊

Study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Network Health Information Search Behavior of Professional Women and the Regulating Effect of Social Support

Xia Jiabei Deng Zhaohua Wu Tailai
School of Medical and Health Management, Tongji Medical Colleg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30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Studying the online health information search behavior of professional women and exploring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can help the health information platform to provide targeted information services for professional women and meet the health information needs of professional women. [Method/process]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stress coping theory and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a model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ternet health information search behavior was constructed, considering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social support on stress, professional women were taken as research objects, and empirical research was conducted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Result/conclusion]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the work pressure, family pressure and physiological pressure faced by professional women will cause women to have anxiety, thus prompting them to search for online health inform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usefulness and ease of use of the Internet also determine the online health information search behavior of professional women.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we find that social support not only does not alleviate the impact of various stresses, but it will exacerbate stress, especially the impact of physiological stress.

Keywords: professional women online health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search behavior

chinaXiv:202304.00024v1

《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发布出版伦理声明

为加强和增进学术论文写作、评审和编辑过程中的学术规范、科研诚信与学术道德建设，树立良好学风，弘扬科学精神，坚决抵制学术不端，建立和维护公平、公正、公开的学术交流生态环境，《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包括《图书情报工作》《知识管理论坛》两个期刊编辑部）结合两刊实际，特制订出版伦理声明并于 2020 年 2 月正式发布。

该出版伦理声明承诺两刊将严格遵守并执行国家有关学术道德和编辑出版相关政策与法规，规范作者、同行评议专家、期刊编辑等在编辑出版全流程中的行为，并接受学术界和全社会的监督。共包括三大部分，总计十五条，分别为：一、作者的出版伦理（①学术论文是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②学术不端是学术论文的毒瘤；③作者是学术论文的主要贡献者；④ 作者署名体现作者的知识产权与学术贡献；⑤学术论文要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与信息安全；⑥参考文献的规范性引用是学术规范的重要表征；⑦要高度重视研究数据与管理的规范性；⑧建立纠错与学术自我净化机制）。二、同行评议专家的出版伦理（⑨同行评议是论文质量的重要控制机制；⑩评审专家应遵守论文评审的相关要求；⑪评审专家要严格遵循相关的伦理指南和行为准则）。三、编辑的出版伦理（⑫编辑应成为学术论文质量的守护者；⑬编辑应在学术道德建设中发挥监控作用；⑭编辑要成为遏制学术不端的最后屏障；⑮对学术不端实行“零容忍”）。

全文请见：http://www.lis.ac.cn/CN/column/column291.shtml

（本刊讯）